



博雅文丛

经典与传统： 先秦两汉诗赋考论

方铭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博雅文丛





博雅文丛

经典与传统： 先秦两汉诗赋考论

方 铭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京)新登字 002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经典与传统:先秦两汉诗赋考论/方铭著. -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3. 11
(博雅文丛)

ISBN 7-02-004255-4

I. 经… II. 方… III. ①古典诗歌-文学研究-
中国-先秦时代②古典诗歌-文学研究-中国-两汉
时代(前 202~220) IV. I20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44468 号

责任编辑:葛云波 装帧设计:何 婷
责任校对:葛云波 责任印制:周小滨

经典与传统:先秦两汉诗赋考论

Jing Dian Yu Chuan Tong Xian Qin Liang Han Shi Fu Kao Lun

方 铭 著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100705

北京泰格彩色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225 千字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0.5 插页 2

2003 年 11 月北京第 1 版

2003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

ISBN 7-02-004255-4/B·279

定价 21.00 元

序

二十世纪科学技术的空前发展,带来的是全球范围的交往和交流普遍化和一体化,而这一点,最突出地表现在经济与技术的全球资源共享、成果共享方面。由于这种共享的特点主要表现为发达国家的经济技术输出,所以,欠发达国家在全球化倾向下在输出自己的不可再生的资源的同时,也换来了经济与技术的不断发展,因而一方面发达国家的经济技术加速发展,而欠发达国家的经济技术也相应有所改善,因此,如果说全球化带来了全世界范围的经济繁荣,科技进步,人民生活改善,基本上是准确的。

由于发达国家的文化传统是发达国家产生经济和技术成果的人文基础,也就是说,发达国家经济和技术的进步适应了发达国家的文化需求,而发达国家的经济技术的发展又促进了发达国家文化的进一步发展,因此,在很显然的层面上,发达国家的文化处于力量和心理方面的强势地位,所以,发达国家在输出经济和技术的成果的时候,有理由、有信心进行文化扩张,而经济技术的输入国为了适应经济技术一体化的现实,并取得一定的发展,也有理由、有必要接受文化的扩张。不过,经济技术的输入或者输出远比文化的输入输出简单容易。由于历史的复杂性、民族的多样性、传统的差别性以及现阶段社会制度、主导价值观念的差异,使处于经济弱势地位,因而在文化传统上也处于

弱势地位的人们对经济一体化可能引发的文化交融产生自觉或不自觉的反抗心态。因此,文化扩展相对于经济技术扩张来说,其变化是渐进的。对于强势文化来说,它们要尽可能地寻求与被扩张文化的结合点;对于弱势文化来说,它们要竭尽全力保卫自己的文化,虽然这种保卫可能从本质上说是病态的、徒劳的,但是,对于弱势群体来说,又是它们寻求自己的历史自信所必需的。这样,在经济一体化时代,文化的一体化是必然的,但是,这种一体化是在多样性表象掩盖下的文化交融和价值观的趋同。

事实上,正像人类历史就是不断全球化的一个过程一样,经济一体化和文化交融及价值趋同,也是由来已久。中国二十世纪的历史,就是一个文化趋同的历史,几代中国人努力把自己纳入世界大家庭,一些人致力于以西方价值观和社会观改造中国的社会制度,并取得了成功,一些人则背弃祖国,只身融入西方社会之中,成为西方社会强势文化的直接实践者。

虽然说二十世纪的文化融合和文化趋同的程度超过了过去的任何时代,但是,在二十世纪文化趋同的历史中,有两种截然不同的反抗心态值得关注:一种是反抗外来文化,采取民族文化霸权主义的文化立场;一种是反抗传统文化,采取民族文化虚无主义的文化立场。这两种倾向之所以都是反抗心态的表现,是因为他们都缺乏理性的思考,其结果必然都是有害的。克服这两种倾向,是我们走向新世纪,并融入世界大家庭的前提。而要克服这两种倾向,最关键的问题是正确认识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的关系。要正确认识中国文化和世界文化的关系,需要树立以下观念:

第一,必须认识到人类的最终价值追求应该是一致的。人类的最高目标是追求人生的幸福,而幸福的标准不论古今中外,

应该是一致的。用托尔斯泰在《安娜·卡列尼娜》里的说法,就是幸福的家庭大致相同,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也就是说,幸福的人生必然具有相似性,比如说自由、富足、健康、友谊等等,而幸福的条件的任何一个要素的缺失,都会带来不幸的人生体验。

第二,必须认识到中国文化是世界文化的一部分,把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割裂开来或者对立起来的做法是错误的。建立了中国文化是世界文化的一部分的观念,就可以使我们认识到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全球范围的文化交流与文化融合,同样包含着中国文化在全球范围的交流和融合。也就是说,中国文化作为世界文化的一部分,在全球化的时代,虽然充满了挑战,但也同样充满着机遇,中国文化也可能通过文化扩张为人类文化的发展提供新的机会。

第三,必须认识到中国文化的发展历史就是一个不断全球化的过程。中国文化虽然在历史上长期处于强势文化地位,但是,中国文化既是在处于最强势地位的时候,也只是世界文化的一部分,也积极地吸收了外来文化,比如印度文化、伊斯兰文化。中国对外来文化的吸收,对中国文化的发展是有利的,而这种有利性在中国经济技术处于弱势地位的时候,表现则更为明显。

第四,必须认识到文化发展有一个自由选择、优胜劣汰的法则,这个法则不仅意味着选择者的权利,同时也是文化存在或者消亡的自然法则,某种强势文化的扩张,正是其自身价值和所具有的普遍性特点的反映。

第五,必须认识到中国传统优秀文化遗产所显示的价值追求与二十世纪以来的西方文化所倡导的价值追求具有相同的价值趋向。特别是在中国文化史上具有核心地位的孔子所倡导重

视人的权利的仁的思想、重视社会公正的大同的思想,及与孔子思想形成补充的庄子所倡导的追求人的自由与独立的思想,是与西方文化的精神追求不二的原则,而孔子所倡导的君子人格和圣人人格,并可能成为对西方文化价值观的修正和补充。

第六,必须认识到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文化一体化和趋同是双向的。因此,也是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机遇,为积极实现中国文化的广泛传播提供了方便。

建立如上认识,我们反过来检讨历史,我们发现,民族文化霸权主义者不能认识到人类的终极追求的一致性,不能认识到中国文化是世界文化的一部分,不能认识到中国文化是一个不断全球化的过程,不能认识到文化发展的自由选择、优胜劣汰的自然法则;而民族文化虚无主义不能认识到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价值,因为他们没有机会仔细阅读中国传统文化最为经典的著作,而以讹传讹,人云亦云,基于此,他们没有弘扬中国文化的信心。因此,我们在经济技术一体化带来的文化趋同面前,应该尊重自然法则,努力宣传自己,又努力学习别人,既敢于宣传自己,也敢于允许别人扩张,以此作为建立新时代的新文化的契机。

研究历史,是为了立足今天,谨以此文,为本书之序,庶几可以略表私心。

目 录

序	1
第一章 孔子与中国古代学术	1
第一节 出土文献与孔子尽善尽美的审美理想	1
第二节 孔子及其后学思想与自由主义精神	15
第三节 孔子与战国文学的繁荣	41
第四节 文化自觉与君子人格 ——兼论中国传统文化精神中君子人格目的的现代价值	62
第二章 《诗经》与中国古代文学传统	82
第一节 《诗序》与《诗经》现实主义文学传统的建立	82
第二节 诗志与古代文学存在的价值与研究意义	94
第三节 《孔子诗论》与孔子文学目的论的再认识	105
第四节 刘勰《文心雕龙》的《诗经》观	112
第三章 战国文人心态及楚文化研究	125
第一节 战国文人的爱奇心态及对战国政治及文学的影响	125
第二节 从庄子与屈原的审美理想看楚文化	140
第三节 战国道家流派论	153
第四章 屈原及楚辞研究	169
第一节 君子儒与小人儒及屈原行为的正义性问题	169
第二节 屈原作品叙述方法刍议	190

第一章 孔子与中国古代学术

第一节 出土文献与孔子尽善尽美的审美思想

一、出土文献与孔子地位的再确认

孔子是中国文化史上最为重要的一个学者,其主要原因有二:第一,孔子的教学活动培养了中国文化史上最早的人文学者;第二,孔子的思想是中国古代人文思想建立的基础。孔子是一个教育家,孔子教学,有教而无类,“欲来者不距,欲去者不止”^①,招收学生,不论等级,使普通平民通过学习可以成为文学之士,在社会中谋求到自己的生活地位,所谓“虽庶人之子孙,积文学,正身行,能属于礼义,则归之卿相士大夫”^②,如孔子的学生“子赣、季路,故鄙人也,被文学,服礼义,为天下列士”^③。这种私人讲学风气,在孔子弟子那里,仍然得到继承,因此更多的出身庶人皂隶工商之贱人,通过努力学习而成为文士,最终投身于中国文化的发展事业。

① 《荀子·法行》。

② 《荀子·王制》。

③ 《荀子·大略》。

孔子在培养弟子的时候，不仅仅传授知识，更重要的是培养一种积极进取、善良正直的人格。孔子常常以成为“士”、“志士”、“士之仁者”来期许学生。孔子指出：“士志于道。”^①“行己有耻。”^②“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③孔子弟子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④孔子弟子子张曰：“士见危致命，见得思义。”^⑤在孔子及其门人弟子的心目中，“士”应具有学识、志向、道德、仁义忠信、勇敢的品质和才能。士的志向就是以天下为己任，救民于水火，对天下具有强烈的责任心，同时又注意自身才能、智慧的培养。正是这种新士风，造就了中国古代文人士大夫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现实使命感。这种强烈的责任心和现实使命感，既表现为对现实政治的参与，也表现为通过著作来拯救现实社会的文化活动。

孔子的思想是中国古代人文思想建立的基础，最突出地体现在孔子与六经的关系上。六经是孔子以前中国文化的结晶，而不仅仅是儒家文化的源头。《庄子·天下》云：“古之人其备乎！配神明，醇天地，育万物，和天下，泽及百姓，明于本数。系于末度，六通四辟，小大精粗，其运无乎不在，其明而在数度者，旧法，世传之史尚多有之；其在于《诗》、《书》、《礼》、《乐》者，邹鲁之士，搢绅先生多能明之。《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道家的重要代表

① 《论语·里仁》。

② 《论语·子路》。

③ 《论语·卫灵公》。

④ 《论语·泰伯》。

⑤ 《论语·子张》。

庄子不仅指出了六经的经典地位,同时对六经的内容也作了精辟的概括。

孔子在中国文化史上的重要性,我们从《左传》、《易传》、《论语》、《孟子》、《荀子》、《史记·孔子世家》、《汉书·艺文志》等传世文献书中是早已了解了的。孟子云:“圣人之于民也,亦类也。出乎其类,拔乎其萃。自生民以来,未有盛于孔子也。”^① 圣人之传承,自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再至孔子,一脉相承,而孔子又为最盛,孔子岂是浪得虚名?孔子居仁行义,为政以德,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故近世儒学宗师马一浮先生学际天人,贯通中西,然后提出“六艺该摄一切学术”、“西来学术亦统于六艺”的论点,认为“圣人往矣,其道则寓于六艺,未尝熄灭也。六艺是圣人之道,即是圣人之知,行其所知之谓道”,《诗》教主仁,《书》教主智,合仁与智,则为至善;《礼》是大序,《乐》是大和,大序大和,合为至美;《易》穷神知化,显天道之常,《春秋》正名拨乱,示人道之正,常之与正,合为至真。^② 孔子及六经所具有的现代意义是孔子在二十世纪应该发挥其不可替代的作用的根据。然而,正如孟子所言:“由孔子而来至于今,百有馀岁,去圣人之世若此其未远也,近圣人之居若此其甚也,然而无有乎尔,则亦无有乎尔。”^③ 《汉书·艺文志》也说:“仲尼没而微言绝,七十子丧而大义乖。”孔子本意,至孔子弟子之后而不传,近世之人怀挑剔之怨望,望文生义,断章取义,自所难免。由于对孔子的本意不能洞察,对孔子的重要性认识

① 《孟子·公孙丑上》。

② 《泰和会语》,河北教育出版社“中国现代学术经典”《马一浮卷》,1996年版。

③ 《孟子·尽心下》。

不足,随着岁月的流逝,对孔子的思想实质出现了有歧义的解释,孔子与六经的权威性也就发生了动摇,因而就有了否定孔子的绝对权威,进而渐渐出现否定孔子与六经关系,否定孔子思想的现代意义的言论,而二十世纪的中国学术界,更是将这种倾向发展到了一个全新的境地。

事实无情。当我们在检阅出土文献的时候,我们发现孔子与六经及中国古代文学的关系,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密切和重要得多。如《论语·述而》曰:“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汉书·艺文志》曰:“《易》曰:‘宓戏氏仰观象于天,俯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至于殷周之迹,纣在上位,逆天暴物,文王以诸侯顺命而行道,天人之占可得而效,于是重《易》六爻,作上下篇。孔子为之《彖》、《象》、《系辞》、《文言》、《序卦》之属十篇。古曰《易》道深矣,人更三圣,世历三古。……”宋人欧阳修怀疑《易传》与孔子的关系,到了近代,怀疑者更多,如钱穆、李镜池等人都撰文予以说明,认为《论语》中的五十学《易》为不可靠,否认《易传》和孔子的关系,钱穆先生为此提出十个证据,其中六个证据证明孔子不作《易传》,另外四个证据“要更进一步说,孔子对于《易经》也并未有‘韦编三绝’的精深研究,那孔子作《十翼》的话自然无根据了。”^① 马王堆帛书《易传》之《系辞》、《二三子》、《易之义》、《要》、《繆和》、《昭力》的出土,使孔子与《易传》的关系变得明晰起来了。帛书《易传》为孔子易说,而今本《易传》,虽然有部分后人杂入,但《乾文言》、《坤文言》、《系

^① 参见钱穆《论十翼非孔子作》、李镜池《易传探源》,载黄寿祺等编《周易研究论文集》(第一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

辞》的主要内容皆为孔子所作,已可作定论。^①

又《史记·孔子世家》曰:“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汉书·艺文志》曰:“《书》曰:‘诗言志,歌咏言。’故哀乐之心感,而歌咏之声发。诵其言谓之诗,咏其声谓之歌。故古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孔子纯取周诗,上采殷,下取鲁,凡三百五篇。……”王充《论衡·正说》曰:“《诗经》旧时亦数千篇,孔子删其重复,正而存三百篇。”后世学者则有人断然否定孔子与《诗经》的联系,否认删诗的可能性,因为今日所见逸诗不多,殊不知三千篇中多有重复,而被删之诗,其引用的概率必然较低。《国语·鲁语》载孔子先祖正考父“校商之名颂十二篇于周太师,以《那》为首”,有人怀疑《商颂》为春秋时宋国人正考父颂扬宋襄公的作品,而司马贞《史记索隐》指出宋襄公晚正考父一百余年,杨公骥教授《商颂考》据此考证《商颂》为商朝作品^②,论证绵密,足可谓不易之论,而今《诗经》有《商颂》五篇,则《商颂》之被删,且幅度之大,于此可见一斑。由此可知,《诗经》中的作品,原不止现在之数,其形成过程中经过删节也是无疑的。近年上海博物馆收集的战国竹简共有一千二百多支,字数在三万五千左右。竹简涉及到八十多种(部)先秦的古籍,其中孔子或子夏的《诗论》,在以往的古籍中未见记载,而竹简中首次发现的一些诗歌,并不见诸《诗经》,但艺术风格与《诗经》颇

① 参见郭沂《从早期易传到孔子易说——重新检讨易传成书问题》,《国际易学研究》第三辑,华夏出版社1997年版。廖名春《帛书易传初探》,台湾文史哲出版社1998年版。

② 杨公骥《商颂考》,见杨公骥《中国文学》(第一分册),吉林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

为相似。另外，如郭店楚墓竹简出土之《缁衣》^①中，既有三百篇之诗，也有逸诗。因此，我们相信以后的出土，还会发现新的逸诗，则孔子与《诗经》的关系，也一定比我们今天所可以确认的要更加密切。

二、出土文献与孔子的大同理想和公羊三世学说

孔子地位的确认，既依赖于对孔子与六经的联系的新确认，更依赖于对孔子思想的现代意义的挖掘。出土文献不仅仅让我们重新恢复孔子与六经联系的信念，也对于我们认识孔子思想的现代意义有新帮助。孔子在《礼记·礼运》中提出大同理想：“昔者，仲尼与于蜡宾，事毕，出游于观之上，喟然而叹。仲尼之叹，盖叹鲁也。言偃在侧，曰：‘君子何叹？’孔子曰：‘大道之行也，与三代之英，丘未之逮焉，而有志焉。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知，以功为己，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选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谨于礼者也，以著其义，以考其信，著有过，刑仁讲让，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执者去，

^① 《郭店楚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98年版。

众以为殃，是谓小康。”所谓大同，就是人人一切平等，就是民主政治，而孔子之赞扬尧舜禹的圣治，就是赞赏民主，如《论语·泰伯》之言“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与焉”，“大则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指出原始氏族社会的特点是遵从天的平等公正，而“不与”，即“无为”，也就是说要给人民以充分的自由。与此相对应，孔子对小康之世存有批判，天下为家是专制主义的特征，与大同背道而驰，所以孔子深为不满。今人多强调孔子欲恢复周礼，周礼所代表为小康政治，与民主政治相反，殊不知孔子的最终理想是实现大同，他希望在礼崩乐坏的环境中，通过恢复周礼，为大同理想的实现积累基础，通过礼制秩序的建立，由德治最终发展为自然之道治。

孔子的大同理想，在后代没有引起足够重视，是源于人们怀疑《礼记》作为先秦典籍的可靠性。近年郭店楚简出土的诸儒家典籍，不仅有《礼记》中的大量篇章，而且，有一些传世文献所不载的儒家文献，后者使我们清楚地发现了儒家限制君主官吏的权利，倡导君主官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而论述禅让思想的《唐虞之道》更可以作为孔子后学发挥孔子仁爱民主平等思想的纲领。《唐虞之道》以禅让为大仁大义大圣，曰：“唐虞之道，禅而不传。尧舜之王，利天下而弗利也。禅而不传，圣之盛也。利天下而弗利也，仁之至也。”“尧舜之行，爱亲尊贤。爱亲故孝，尊贤故禅。”“孝，仁之冕也；禅，义之至也。”“爱亲忘贤，仁而未义也；尊贤遗亲，义而未仁也。”“方在下位，不以匹夫为轻；及其有天下也，不以天下为重。有天下弗能益，亡天下弗能损，极仁之至，利天下而弗利也。禅也者，上德授贤之谓也。上德则天下有君而世明，授贤则民兴教而化乎道。不禅而化民者，自生民则未之有

也。”^①在这里，作者把“仁”、“义”、“圣”与天下为公的大同“禅让”的理想结合起来，并认为真正的治世的到来必然依赖于建立“禅让”的民主政体，这就使“仁”所具有的自由精神就更加清晰，从而也证明孔子及儒家思想决不是维护政治的专制主义体制的，而是把实现大同看作是最后的归宿。

在专制时代开始以后，能准确把握孔子思想精粹的，首先是西汉儒生，其实践就是鼓吹禅让，并最终在王莽时代付诸实施。不过，西汉的禅让之弊在于缺少禅让制度的逻辑发展过程，因此，虽然有禅让之名，却没有大同之实。近人康有为标榜民主革命，以现代西人民主解释孔子的大同理想，则深得孔子理想之三昧。康有为著《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大同书》，首先标榜“爱”，也即孔子所说“仁”，孟子所说的“不忍人之心”，《大同书》说：“不忍人之心，仁也。”《孟子微》说：“一切仁政，皆从不忍之心生，为一切根一切源……太平大同，皆从此出。”康有为认为，只要从博爱的立场出发，就可以产生平等、自由、民主诸观念，进而实现世界大同。这与孔子的逻辑线索一致。康有为把何休在解说《春秋公羊传》时提到的“公羊三世”与“大同”、“小康”之说联系起来，认为“三世为孔子非常大义，托之《春秋》以明之。‘所传闻世’为据乱，‘所闻世’托升平，‘所见世’托太平。乱世者，文教未明也；升平者，渐有文教，小康也；太平者，大同之世，远近大小如一，文教全备也。……此为《春秋》第一大义”^②。在孔子看来，先有大同，其次小康，其次乱世，这是一个社会自觉退化的必然环节，而要拯救退化的社会，不可能直接由乱世实现

^① 《郭店楚墓竹简》，文物出版社。

^② 《春秋董氏学》卷二，《康有为全集》第2册。